

书评|资讯

← (上接5版)

他亲自巡视全国,但西巡和东巡的政治寓意完全不同,出巡西北可以理解为向秦国旧地民众庆贺,特别是宇宙神灵宣告统一。相反东方巡狩完全带有威慑性,即向被征服地区民众、神灵宣示征服。秦始皇曾下令将三万户迁移至琅琊台,设立琅琊郡的目标,显然是为了加强对齐地的控制,镇压齐地遗民。秦始皇抵达琅琊后非常高兴,前后逗留达三个月之久,十分罕见。所以秦始皇歌颂秦德的诸多刻石如泰山石刻、琅琊石刻、碣石刻等都耸立在东方。大型祭祀活动是帝王沟通神灵的特许之一,《史记·封禅书》规定了各种等级的祭祀范围:“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秦的宗教政策是在保有和突出秦原有的宗教祭祀外,全面接纳原各诸侯国的山川祭祀,通过对神祇祭祀的专擅来标志对领土的占有。据李零研究,秦的祭祀结构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秦地固有的郊祀和东方齐鲁封禅。秦始皇东方游巡的目标在琅琊石刻中已表达得非常清晰:

东抚东土,以省士卒。事已大毕,乃临于海。

这样的铭刻都被置放在特定的场所,以使人们广泛知晓,也使文物印迹遗留在皇帝重要的仪式地,所谓巡狩的功能得以具体展现。

当然,秦始皇对东方仍有许多不放心的地方,术士观天象觉得东方有紫气,担心有取代者出现,所以他经常巡游的目标是要去镇压。在汉初人心目中齐地是重中之重,地位仅次于关中。田肯的一段话概括了其重要性:

夫齐,东有琅琊,即墨之饶,南有太山之固,西有瀋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并说“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者。”

秦皇、汉武利用巡狩、封禅来实施对东方的经略,他们对长生不老之术的痴迷,精研天地之奥秘和人事之废兴,练就了一些精通伴君左右政治生存术的东方思想家,这些人成功地兜售了他们的宗教思想。根据文献,天主祠未得到过秦汉皇帝的祭祀;秦始皇曾禅梁父,汉武帝至梁父礼祠地主。阳主祠所在的芝罘,秦始皇曾三至,秦二世曾从游,又于二世元年亲至,汉武帝也亲临。日主祠所在的成山,秦始皇曾二度亲临,汉武帝幸临的次数不详。秦始皇、秦二世、汉武帝曾多次到过四时主祠所在的琅琊。汉宣帝于寿良祠兵主,于曲城祠三山八神,遍祠阳主、月主、日主、四时主。

秦汉时期的祠畤的主流大多延续了战国时期或更为古老的祠祀,雍城是秦汉帝国的祭祀中心,因为有先王宗庙和高等级的祭祀而成为圣都。将八主纳入之后,一些祭祀对象的地位得到提升。不过八主祠祭除宣布将东方祭祀体系纳入帝国的主流祭祀外,另一个目的则是在齐、燕方士的唆使下,以八主祭地为基点,向外寻求长生不老仙药,以满足他永生不老的意愿。秦初的术士在皇室有着广泛的影响,秦始皇的向东巡狩至海上,明显是受到方士怂恿,让他求仙,他本人也满脑子神仙思想希望长生不老。虽然他派韩终求不死之药并无下文,但他却将与上天沟通的祭祀权力牢牢地掌控手中,并形成以后的制度,即皇帝来则祭祀,皇帝不至则没有祭祀活动。祭祀的目标《汉书·天文志》说得很明白:“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于天。”而诸多的祭祀活动权力会下放到地方,地方诸侯祭祀即可,西汉初年的“名山大川在诸侯,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领”。八主祠祭祀的地位显然在名山大川之上,秦始皇开始的皇帝祭祀虽然表面上提升了八主祠的地位,但实际上却是由皇帝垄断与上天的交通渠道。“天齐”本是齐国原有的祭祀对象,“天齐渊”本为泉水,把它想象为天之腹脐来寓意天下的中心所在。此意念被借用至都城长安,在汉长安城外今人所称天齐塬上发现以一巨型坑为主体的遗址群,为模仿“天齐”祭祀,挖坑以像天之腹脐来借喻为天下中心。这些祭祀对象的地位、祭祀内容与形式在不同时期随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改变。

考古成果对思想史的贡献

本书作为一部考古学著作,我愿意指出它的一个重要贡献——完善而仔细的考古调查活动,再辅以对各种文献古籍的理解,不但对于理解古代建筑遗迹本身有所帮助,也在一些具体遗址的分析中,表达了对古人世界观内容的重要理解。

我们不仅仅要看到这些结果的重要性,更要了解考古学者如何通过自己本身的学科路径来关注已经逝去的古代思想概念,并且经过长时段的田野工作,使一些原本不很清晰的零星片段思想在考古遗迹的基础上获得阐发。诸多的遗址实际上需要在一种思想指导下进行通盘的整合。在这样的思路指引下,八处相关遗址经过考古调查被纳入同一框架内,完整的八主祭祀得以重现。而八主祭祀对于过去学术界来说是一个相当陌生

的题目,无论秦汉史还是思想史。历史上有许多当时流行的思想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社会生活中被移除,也消失于人们的记忆之海。考古学的贡献在于当消亡的迹象重新出现时,我们有合理的诠释空间,使一些看似无序的内容获得有序的排列,发掘出一段历史思想的空白。这方面八主祠的发掘与研究无疑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结尾部分讨论了八主祠祭祀在秦汉时期二百年间的思想遗产,对后世祭祀活动的影响。

本书以讨论天、地、日、月、阴、阳、四时在宇宙论中充当构成要素和国家宗教等意识形态的变化,强调政治上的一元化和宗教上的多元化,作为全书的总结。这些内容也被用来安排人间社会秩序,在战国晚期和汉初的文献中都有反映。八主祭祀的废除,除去宗教因素外,实际上代表了皇帝对于神仙世俗性话题的有意减弱。如果说考古调查或发掘者本身已经意识到议题的重要性,又没有特别的理由放弃,类似的理解总结则尤显必要。

山川祭祀的正当性、神圣性在秦始皇时期就获得确认,但是他在区分重要性的同时将东方六国的八主祭祀提升到同样重要的位置,关东八主祭祀的神圣性得到捍卫。汉初政权继承这种传统,但在实际运作中却表现得并不平衡,以八主为首的六国祭祀体系使皇帝在巡幸时更具象征意义。汉武帝的目标恐怕是通过祭祀活动使统一的政治局面得以加强,这种东西峙立的祭祀格局在五岳四渎制度出现后被打破,汉宣帝最后对八主的祭祀举动,或许代表东方祭祀制度的终结。成帝时儒家人物已经占居要津,对皇帝产生重要影响,他们按照儒家的理想来设计国家祭祀制度。一些祭祀对象被移除或调整,所强调的理由是祭祀成本增加,国家经济不堪重负,实际是理念的变更,围绕京师长安新立祠庙是新兴祭祀制度确立的结果。

总的来说王莽的郊祀制度显然是儒家思想完全占据上风的结果,他们透过郊祀制度建立儒家为主导的思想体系,而后者是二千年以来经学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过去对于儒家的宇宙观尤其是反映在祭祀制度中的宇宙观呈现,了解程度有限,到底他们是直接诠释主张,还是透过郊祀传达其涵义,其中八主祠祭祀在国家祀典中占有多大的比重,过去并不十分清晰,只知道四时祭祀或承袭原有的内容;其他的祭祀则沦为民间信仰,祭祀活动则时隐时现,维持了很长时段。现在通过东方齐地的八主祠遗迹考古调查发掘,我们也有可能讨论从前模糊的一些课题。

尽管从汉成帝到王莽制度确立之间,祭祀制度有若干反复,这显然是由于祭祀内容到祭祀地点在认识上的不统一造成的。最后完全成熟的郊祀制度在王莽朝确定,正月的南郊天地合祭是由皇帝亲祭,其余南郊、北郊祭由有司主持奉祀。祭天和祭祖的职能从此分开。

最后我们需要指出该书一些缺点,以尽评者之责。虽然本书贡献卓著,如果硬要指出书中不足的话,则在于面临的难题不少,尚有进一步再深入的空间。

首先,材料来源基本上是调查所得,发掘材料在其中所占比重很少。在有限的材料中,日常的生活遗物较多,可供明确断代的遗物较少,尤其是和祭祀活动有关的遗物。在时间上,从遥远的石器时代陶片到东汉建筑遗址中的砖瓦都有,当然这些都是由考古学科本身性质决定,但由于所要讨论的问题是意识形态,仅凭一般有限材料来讨论指向性非常明确的议题,显然有些力不从心。

不过,一些相当重要的、很可能与祭祀活动有关的文物,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和讨论。例如芝罘岛中部阳主庙在房基下的土坑内出土两组八件玉器。出土玉器一圭、二觚,第二组玉器与第一组玉器器类、形制相同。出土在阳主庙的房基之下的两组玉器,大约很可能是汉代祭祀活动中被瘞埋下的,原简报中并未给予有价值的学术解读,这次的进步仅限于清晰的照片、线图和一般性的描述。早期祭祀的玉器与祭祀之间的关系,业经学界讨论,本书并没有有效地吸取这些成果。

书的最后明确指出,这种安排八主祭祀的政治思想理念,暗合了二百多年后王莽改制中确立的并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郊祀制。当然这种说法并非由考古迹象本身推导而来,而是从八主祭祀的学理分析所致,明显超出一部考古著作要解决问题的范围。考古学应该如何介入思想史问题?虽然这样的讨论确实具有特别的意义,然而如果冒险做出通盘性的检讨,则现有的考古材料并不能充分支持这种讨论。

中国考古学开始关注中国古代思想问题,这显然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开端,由祭祀入手来讨论思想史的主要问题也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我们进而可以关心古代社会中的思想演进这类重要话题。这些都有赖于学人的共同努力,我们期待在这方面的进一步贡献。

(作者为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

博学的人



古人说,君子以一事不知为耻。但今天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我们的教育和研究所得,充其量只是局

部的知识,而那些有价值的发现,很可能在将来被推翻或更新。尽管如此,每隔一段时间,人类历史中就会涌现一些智力卓绝的人,他们似乎知道一切,寻求学习一切需要知道的东西。我们会称赞他们是“博学的人”。

文化史学者彼得·伯克近期出版了《博学的人:从列奥纳多·达·芬奇到苏珊·桑塔格的文化史》(耶鲁大学出版社,2020),描写西方社会几百年的博学通才,并在书后附有多达500人的名单。

伯克对西方社会知识的历史及其组织形式有着持久的兴趣,其著作中译本有《制造路易十四》《图像证史》《知识社会史》等。在《博学的人》一书中,他简要概述了这些天才的成就和抱负,并关注特定科学分支的兴起,以及随着文化的变化,学习一切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

伯克指出,西方之外当然也有博学者,比如那些兴趣广泛的伊斯兰学者,曾大力阻止了古代世界知识的大量流失。而在西方,这种对知识无止境的求索,常常与文艺复兴联系在一起,其原型便是列奥纳多·达·芬奇。然而在渴望学习的同时,他又常常不耐烦,做事不能有始有终,伯克称之为“列奥纳多综合征”,这是多才多艺者的典型缺陷,他们的思维无休止地阻碍他们好好完成作品。

到了17世纪,产生了那些“博学怪物”:他们收集了成千上万的书,学习了几十种语言,写作诗歌的同时,关注科学的最新发展,甚至管理城市的事务。到了18世纪,博学者们的情况发生了转变,学者们不再把宇宙看作是一个有生命存在,而更多地视为一台机器。随着专业化程度的提高,通晓整体知识的目标变得更具挑战性和必要性。一方面,各种学科使用了外行难以理解的术语或方法,提高了学习门槛,但另一方面,能够纵览全局,指出专家们遗漏的联系,也为新的发现和发明开辟了道路。

伯克书中也提到了一些女性博学者,遗憾的是,书中没有一位非裔博学者,没有杜波依斯,没有法农,也没有发起哈莱姆文艺复兴的阿兰·洛克。

伯克也书写了过去75年来跨学科项目的兴起。在结尾处,这位历史学家担心,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当我们触手就能找到如此之多的知识时,我们正在丧失深入挖掘并真正沉浸在各种学科之中的能力。

(编译/席庸)